

马克思论太平天国革命运动

——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

唐 明 邦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了。他所阐述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正指引着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实践,他的崇高理想正日益变为现实。他生前对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和革命精神的科学分析和热情赞美,一直鼓舞着并将永远鼓舞中国人民为保卫社稷、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英勇战斗。

十九世纪中叶,古老的中国爆发了空前规模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1853年三月,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南京)。这年六月,马克思发表了重要著作《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科学地分析了这一革命运动产生的原因,热情地赞美了中国人民的革命精神,并对这次革命的伟大国际意义,作了极高的评价。马克思观察、分析问题的立场和方法,是我们学习的楷模。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受到了马克思的称赞,永远是中国人民的骄傲。

—

早在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前夕,在其急剧酝酿阶段,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对中国革命运动寄予殷切希望,预言中国人民不堪忍受封建专制与殖民侵略,定将奋发起来,推翻封建统治,予殖民强盗以沉重打击。他们在1850年一月《国际述评》中写道:“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会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末他们说不定会看见这样的字样: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①果然,此伏彼起的农民暴动和少数民族的武装反抗,终于在1851年汇合为空前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它高举“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革命旗帜,颁布“有田同耕,有饭同食”的革命纲领,把斗争锋芒指向封建制度,同时,沉重地打击殖民侵略者。这一革命消息传到欧洲,马克思闻之感到极大的欢欣鼓舞。他写道:“在桌子开始跳舞以前不久,在中国,这块活的化石上,就开始闹革命了”。^②还说“刚巧在全世界似乎都处在沉静状态的时候,中国和桌子都开始跳舞起来鼓励大家了。”^③

马克思对这一革命运动爆发的社会根源,作了深刻的分析。

当时,殖民主义的反动喉舌,对革命产生的原因,作过种种卑劣议论。或称为“反满”的种族斗争,或称为单纯宗教革命,或说是改朝换代的重演,或说是“人口过剩”引起的骚动。异口同声贬低它反封建、反殖民侵略的革命意义,掩盖革命爆发的真象。

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中,予这一问题以科学的回答。“中国的连绵不断的起义已延续了十年之久,现在已经汇合成一个强大的革命,不管引起这些起义的社会原因是什么,也不

管这些原因是通过宗教的、王朝的还是民族的形式表现出来,推动了这次大爆炸的毫无疑问是英国的大炮,英国用大炮强迫中国输入名叫鸦片的麻醉剂”。④后来,马克思在《中国记事》中,分析得更具体:“运动发生的直接原因显然是:欧洲人的干涉,鸦片战争,鸦片战争所引起的现存政权的震动,白银的外流,外货输入所引起的经济平衡的破坏,等等。”⑤这一科学分析,包括三层深刻内容:

“欧洲人的干涉”、“白银的外流”——揭露了殖民侵略者吸吮中国人民血汗的罪行。西方资产阶级,推行暴力扩张政策,用兵舰和大炮强迫落后的中国同他们通商,从而“使农民的民族依赖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依赖于西方”。⑥殖民主义者对他们的暴力扩张找来种种论据,正如马克思所说:“这个论据在‘强权即公理’这句有名的格言上表扬得更好。”⑦殖民主义者从中国榨取大量银子,源源不断运往本国去扩大再生产,进一步剥削本国无产阶级。他们在干海盗式的吸血勾当时,却打着“友好”、“和平”、“传播文明”等幌子。马克思无情地揭露道:“当我们把自己的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因为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很有体面的样子,而一到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⑧正是这种殖民强盗的“野蛮本性”激起了中国人民的革命怒火。

“外货输入所引起的经济平衡的破坏”——揭露的是殖民主义侵略造成封建经济解体的社会危机。封建制度下的“经济平衡”,是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的平衡。这种平衡,长期靠“闭关自守”政策来维持。自从英国大炮轰开中国大门,资本主义商品,如洪水猛兽冲入中国市场。鸦片战争后,输入大量洋纱、洋布,使沿海地区手工纺织业开始破产;大宗出口的丝、茶业,几乎全被外资操纵,走上依赖外资的道路;五口通商后,沿海出现一批半殖民地和殖民地性质的城市,买办商人帮助外国资本扼杀民族资本。封建经济日益破产,民族资本的独立发展又已绝望。殖民主义者破坏了中国的旧世界,却不让中国人建立自由资本的新世界。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劳动人民在两重大山压迫下挣扎。殖民主义对中华民族的剥削、压迫日益加强,劳动人民反对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斗争,不可避免地日益尖锐,太平天国运动正是其集中表现。

“鸦片战争所引起的现存政权的震动”——揭露的是垂死挣扎中的封建制度面临全面崩溃的政治危机。在鸦片战争中妥协投降、丧权辱国的清王朝,皇帝的权威在臣民眼里扫地以尽;为转嫁战争赔款,对人民的压榨更加残酷;文武官员贿赂风行,贪赃枉法;行政机构腐朽已极而彻底瘫痪;封建统治更加黑暗反动,社会道德愈趋沦丧。腐朽的封建王朝日薄西山,不可救药。马克思对此作了淋漓尽致的描绘:“所有这些破坏性因素,都同时影响着中国的财政、社会风尚、工业和政治结构”。“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⑨反动透顶的封建王朝,再也无法用封建道德的说教来安定它的臣民了。人民已无法照旧生活下去,只好揭竿而起。鸦片战争后十年间,群众武装暴动达七十余次,回、藏、苗、瑶、壮、彝等少数民族也相继武装反清,捻党、白莲教、天地会、小刀会、拜上帝会等民间秘密组织,成为组织起义的核心。阶级矛盾同民族矛盾交织起来,终于汇合成空前的太平天国革命战争。它以单纯农民战争的形式,揭开了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序幕。

太平军所到之处,卷起革命狂飙,杀死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焚毁田契债券,摧毁神庙社坛,对一切封建统治秩序和封建思想枷锁,进行无情扫荡,大大发扬了中国人民的历史

首创精神。他们建立了强大的农民革命政权，统治了南方中国，建树了历史奇勋。

马克思对中国人民在经历漫长的中世纪沉睡之后，开始的新时代的觉醒，作了高度历史评价。他说：“历史的发展，好象是首先要麻醉这个国家的人民，然后才有可能把他们从历来的麻木状态中唤醒似的。”^⑩鸦片输入中国半个世纪，就激起了中国人民的革命觉醒。马克思说：“看起来很奇怪的是鸦片没有起催眠作用，反而起了惊醒作用。”^⑪这对中国人民新的时代觉醒是热情的赞美，对妄图以鸦片来麻醉中国人民的西方殖民者却是辛辣的嘲笑。

英国的大炮和鸦片，没有摧毁中国人民的革命意志，倒是推动了人民革命的大爆发，这就是马克思对太平天国革命动因的科学论断。

二

太平天国革命战争的迅猛发展，动摇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更直接威胁了殖民主义者的利益。特别是他们扼住了长江的咽喉，阻碍殖民主义者把侵略的魔掌伸入中国腹地。殖民主义者亟欲扫除他们发展侵略势力的主要障碍。

马克思早已洞察一切，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中，揭露了西方殖民主义者“企图扶持摇摇欲坠的满清王朝，”^⑫干涉中国革命的罪恶野心。警告他们说：“无论如何，在这个时候，西方各国政府的任何干涉只能使革命更带有暴力的性质，并且延长商业的停滞时间。”^⑬

殖民主义者，起初对太平天国采取欺骗和威胁伎俩。他们伪装“中立”，窥测时机；同时，窃窃私议：“外国人必须准备好足够的武力来击败叛乱者可能施加于他们的任何打击，加以摧毁。”^⑭他们在准备力量，绞杀革命。

殖民主义者，希望太平天国不触犯他们的利益，这是十足的幻想。这一幻想很快就在坚决捍卫民族利益的革命人民面前破灭了。殖民主义者的凶残本象，全盘暴露出来。其反动伎俩是：再次用武力征服清朝统治者，迫使他们成为保护殖民利益的驯服工具；以便互相勾结，镇压共同敌人——太平军。为实现这种一打一拉的罪恶阴谋，英法两国侵略者于1856年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次年，恩格斯再次警告急于干涉太平天国的侵略者说：“广州以北到上海、南京一带地区都掌握在中国起义者手里，触犯他们将是极大的错误。”^⑮利令智昏的殖民主义者，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警告却充耳不闻。

太平天国领袖们，起初对殖民主义者缺乏认识，存在一定幻想。称那些外国人为“洋兄弟”，希望他们严守中立；允许他们友好通商，不准再贩“害人之物”（鸦片）。对“洋兄弟”们的来访，予以友好接待，善意地向他们宣传革命政策，表明革命立场。对他们的威胁、利诱，保持高度革命警惕性。1861年冬，英国海军提督何伯和参赞巴夏礼到了天京，企图诱骗洪秀全共同推翻清朝，“平分”中国。洪秀全断然拒绝说：“我争中国，欲相（想）全图，事成平分（分），天下失笑。不成之后，引鬼入邦。”^⑯侵略者图穷匕现，威吓说：“尔天王兵而虽众，不及我洋兵万人”。“尔不与合，尔天朝不久！待为我另行举动。”^⑰太平天国毫不媚外的爱国立场和仁至义尽的善良努力，丝毫没有感动殖民主义者。他们的反动本性是不会改变的。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反动势力对于人民的民主势力的原则，是能够消灭者一定消灭之，暂时不能消灭者准备将来消灭之。”^⑱果然，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英法侵略军，就全副武装扑向太平天国。1862年春天开始，英国和法国的正规军，美国人华尔组织的“洋枪队”（后改名“常胜军”，1863年由英国人戈登指挥），法国侵略者和中国反动势力组织的“中法混合军”（后改名“常捷军”），配合封建地主武装“湘军”和“淮军”，对太平天国进行了疯狂镇压。封建势力和殖

民主主义者的穷凶极恶，气势汹汹，并没有吓倒革命的中国人民。他们首先从战略上藐视敌人。早在1853年，当英国公使文翰表示“保守中立，不助满人”时，洪秀全就曾以“充满自信心的冷静态度”答复他：“尔等如帮助满人，真是大错。但即令助之，亦是无用的。”^{①9}而今这些拥有洋枪洋炮优势装备的敌人正要扑来之时，太平军更以豪迈英雄气概告戒他们：“倘不遵我王化，而转助逆为恶，相（想）与我师抗敌，则是飞蛾扑火，自取灭亡。”^{②0}分明是扑不灭的革命烈火，贪婪的“飞蛾”们还是要扑来，结果被太平军打得一败涂地。好几个殖民军的头子被打死，所谓“常胜军”、“常捷军”，通通变成了常败军。李秀成回忆1862年第二次上海战役时写道：“那时洋鬼并不敢与我见仗，战则即败。”^{②1}清军头目左崇棠，目睹殖民军的溃败说：“发逆（按：对太平军之污称）麇至，夷兵遂遁。夷人之畏长毛，亦与我同。”^{②2}太平军的战将谭绍光在大败“常胜军”首领戈登之后，愤然说道：“此小创耳，犹不足以释我恨也。”充分表现了中国人民崇高的革命英雄气概。

太平军和人民群众血肉相联，生死与共。将领们多发难于草莽，擢拔于行伍，与士兵同甘共苦，为实现“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伟大理想，同反动的封建正规军和殖民侵略军有不共戴天之仇，故战斗特别勇敢、顽强。他们的英勇战斗精神，却遭到中外反动势力的切齿咒骂。极端仇视太平军的英国领事夏福礼，1862年三月在给英国驻华公使的一个报告中，对之极尽污蔑之能事。说什么太平军都是些“地痞无赖和流氓。”^{②3}“穿着五色相杂的丑角服装。……还有一头又长又黑或染黑的乱发，一双凶狠的眼睛，他们发出惨叫，装出凶恶发狂的样子。”这群“怪物”“拿着大刀、长矛和猎枪，狂叫着向吓得半死的敌军冲去。”^{②4}马克思驳斥了这些无耻的攻击和辱骂，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立场，对西方殖民主义者永远不可理解的东方“怪物”，作了科学分析。当时，封建统治者腐败已极，人民群众毫无政治权利。在这种历史条件下，马克思认为：“他们的全部使命，似乎就在于用奇形怪状的破坏，用全无建设工作萌芽的破坏来和保守派的腐化相对立”。“显然，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②5}马克思对太平军的某些落后斗争方式及其社会原因作了科学的分析和同情的理解，更对他们那种反封建反侵略的强烈仇恨情绪——“魔鬼”精神作了热情的赞许。恩格斯对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华南人民的反侵略精神，也是这样赞许的。“我们不要象骑士般的英国报纸那样去斥责中国人可怕的残暴行为，最好承认这是为了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争，这是为了保卫中华民族的民族战争。”^{②6}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的称赞，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精神。他们同殖民主义贵族老爷们的态度根本相反，不是着眼于这些斗争方式、手段的落后和野蛮，而在于鼓舞这些革命群众为坚持革命理想同国内外敌人进行勇猛的斗争。马克思用这种革命精神教育了欧洲乃至全世界无产阶级，至今仍有着深刻的理论意义和教育意义。

三

马克思不但科学地分析了太平天国革命发生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尤其精确地分析了它的重大国际意义。

予太平天国革命的世界意义以高度评价的，第一个就是马克思。他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战略原则出发，肯定了它对东方革命和欧洲革命的巨大影响。

首先,当太平天国革命狂飙在东方的一角驱动乌云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就预言即将迎来“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②7}

早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指出,西方资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形象 创造一个世界”,首先得创造一个世界市场。这样的市场,在十九世纪中叶已经形成。殖民主义首脑——英国用暴力开辟的“最后一个新的市场是中国”。^{②8}从此,整个东方世界几乎全部沦为西方殖民主义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殖民主义侵略,给东方各国人民造成相同的历史命运和共同的斗争任务。各国人民反封建反侵略的斗争,必然互相支援。在中国,太平天国全力打击封建势力的时候,华南人民展开如火如荼的反殖民侵略的斗争,即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58);在印度,土著士兵发起了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1857—1859);在波斯,英勇的人民,展开了激烈的反英战争(1856—1857)。这些反对殖民侵略的革命斗争,互相呼应,互相鼓舞,牵制、打击共同敌人,陷敌于四面楚歌之中。这些互相呼应的民族革命斗争,使马克思和恩格斯概括出新的革命真理:殖民主义者在东方霸占殖民地,推行殖民政策,必然激起被压迫民族的同仇敌忾;一旦民族革命怒火普遍爆发,定将把殖民主义者及其走狗一齐埋葬。所以1857年恩格斯在评价太平天国革命和华南人民反侵略斗争时写道:“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作垂死的挣扎,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②9}的确,马克思逝世不到七十年,伟大的新中国就如一轮红日在东方升起。他们的科学预言得到证实。

进一步,马克思着眼于太平天国革命的国际环境,高度评价了它对当时欧洲政治革命的重大影响。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欧洲,在1848—1850年西欧各国普遍高涨的革命运动遭到疯狂镇压后,进入政治反动时期。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普遍走向低潮。此时,各国资本主义工业有了惊人的发展,同时潜伏着更为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马克思说:“我们每天都看到,不仅各国统治者和他们的臣民之间,国家和社会之间,阶级和阶级之间发生冲突的迹象日趋严重,而且现时的列强相互之间也发生冲突,这种冲突正在一步步紧张,以致非动武不可。”^{③0}太平天国革命,使殖民主义者的“一个大市场突然缩小”,危及殖民主义的生命线。这个革命首先打击了殖民主义的“心脏”——英国,通过英国,波及整个欧洲。所以马克思写道:“可以大胆预言,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的即将爆炸的地雷上,使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爆发,这个普遍危机一旦扩展到国外,直接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③1}马克思在这里为世界无产阶级阐明了一个重大的革命真理:世界上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必定从外部予殖民帝国以有力打击,从而给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以强大支援。欧洲资本侵入中国,引起中国革命;这个革命反而促成欧洲经济危机和随之而来的政治革命的爆发。马克思从哲学上加以概括,称之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两极相逢”的“万应的原则”。这是马克思对太平天国革命的世界意义的科学评价,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奠基人给予全世界无产阶级用以观察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锐利思想武器。

马克思科学揭示的民族解放运动和殖民主义侵略之间的“两极相逢”(对立统一)的理论原则,不断受到历史检验,证明它是绝对真理。这一“万应的原则”在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中得到光辉的发展。

列宁曾亲自看到中国和亚洲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新高涨,欢呼“世界风暴的新泉源”在亚洲兴起。在二十世纪初期,再次强调世界革命的特点,是“我们现在正处在这些风暴盛行及其‘反转来影响’欧洲的时代”。^{③2}民族解放斗争,在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时,“它所起的

革命作用，也许比我们希望的要大得多”。^③列宁的天才预见，同样已由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所证实，并正在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所证实。

毛泽东同志在近代中国作为东方诸矛盾的焦点的条件下，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辩证法。指出殖民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同时也为自己准备了灭亡的条件。“西方资产阶级就在东方造成了两类人，一类是少数人，这就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洋奴；一类是多数人，这就是反抗帝国主义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从这些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所有这些，都是帝国主义替自己造成的掘墓人，革命就是从这些人发生的。”^④帝国主义向中国人民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侵略，不断加深中国人民对他们的仇恨，“迫使中国人的革命精神发扬起来，从斗争中团结起来。”^⑤“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⑥毛泽东同志对“两极相逢”的革命辩证法作了生动的发展，总结太平天国以来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经验，得到战胜帝国主义的精神武器。

*

*

*

马克思所热烈支持的太平天国英雄们的革命理想，在中国已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并一步步变为现实；马克思所热情歌颂的太平天国英雄们的革命斗争精神，已为伟大的中国人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马克思所憧憬的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同殖民帝国主义进行针锋相对斗争的“两极相逢”的历史场面，正由于中国革命的胜利而大大向前推进。放眼中国和世界历史的新局势，马克思九泉有知该是何等欢欣鼓舞啊！

一九六三年初稿， 一九八二年底修改。

注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65页。

② 桌子跳舞，指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欧洲贵族界流行的一种降神扶乩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第545页。

③ 《资本论》第1卷，第52页（1956年版）。

④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109—110、251、111—112、110、115、115、116、114、109页。

⑤⑪⑲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第545、145、548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70页。

⑦ 马克思《中英冲突》，《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第55页，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

⑭ 1853年英国公使文翰送交英国外务大臣的报告，转引自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第14页。

⑮⑯⑰⑱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233、232、234、234页。

⑩⑪⑲ 《忠王李秀成自述校补本》第119、119、81页。

⑮⑯⑰⑱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81—1182、1517、1488、1491页。

⑲ 《英国政府兰皮书中之太平天国史料》，《太平天国资料》第6册，第903页。

⑲ 李秀成《谕尚海松江人民清朝兵勇及外国侵略者檄》，《太平天国文选》第10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⑲ 转引自《曾文正公全集》，《议复调印度兵助剿折》。

⑲⑲ 转引自马克思《中国记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第546—547页。

⑲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467页。

⑲⑲ 《列宁全集》第32卷，第465、469页。